

等，参与三门峡、刘家峡、葛洲坝等大型水电工程的设计，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曹乐安参加三峡水利枢纽设计研究，他参与工作的葛洲坝工程及其水电组，

1985年获得首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作者为云南师大西南联大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本文是云南师大西南联大研究项目内容之一，立项编号LD2022ZD01）

## 联大有课，呈贡有家

——社会学家吴泽霖的“默庐”岁月

○祝 牧

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机轰炸，著名作家冰心携子女随丈夫吴文藻辗转迁至昆明呈贡，于1938年秋至1940年底居住在呈贡三台山的华氏墓庐。作家自取“墓庐”谐音，将此间寓所命名为“默庐”，继而以散文《默庐试笔》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默庐”雅号遂名扬海内。然而，多数人不知道的是，继吴文藻、冰心夫妇短暂驻足之后，这里还迎来过另一位重要房客，他就是西南联大著名社会学教授吴泽霖。

教务长等职，1935年起还一度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和教务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吴泽霖随大夏大学师生内迁贵阳。1941年2月，受聘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赴昆明。

据《吴泽霖年谱》所述，吴泽霖来昆后最初住在北门街清华教职员宿舍，后搬迁至呈贡县三台山“华氏墓庐”房舍。至于何时迁入“华氏墓庐”，在此居住多久，则并未详述。但据书中所记“1941年9月，回贵阳接子女，约1月方回昆明”，又有女儿吴安伦回忆“抗战时期，我家曾

吴泽霖，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他1913年就读清华学校，是清华“辛酉级”学生，在校期间曾与闻一多、潘光旦同班且友谊最为深厚。从清华毕业后，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进入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西南联大社会系 1942 级毕业生与教师合影。前排右 3 起为教师：吴泽霖、陈序经、陈达、潘光旦、李景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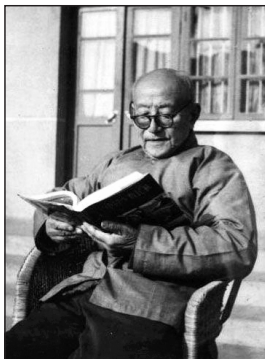
住在昆明呈贡乡下一个小山上”，且在同年12月，吴泽霖与马时芳结婚，至1943年马时芳产后赋闲在家，吴泽霖推荐她去呈贡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图书馆任职，自己也应邀兼任该校教授主讲社会学和社会问题课程两个学期。又有《吴泽霖年谱》载“1945年3月，搬至昆明西南联大励新二村”，推测抗战时期其家寄居呈贡“墓庐”至少三年有余。

除上述所载外，另有只言片语可供佐证。如新中国成立后吴泽霖给有关部门的信中也写道：“1941年我到昆明工作。为了逃避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我把家人疏散到离昆明四十余里的呈贡。”又有戴世光在《吴泽霖老！我在继续向您学习》一文中记到：“吴老把家安置在三台山华氏墓庐房舍，我则住在三台山麓文庙内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单身宿舍……我与吴老就是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合大学内和呈贡县的三台山上，一起从事有关教学的学术研究和生活上互相照顾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与冰心“默庐”后世名声在外相比，吴泽霖在呈贡的这一段经历则显得极为“低调”，现有的零星记录主要见于联大社会学系部分教授及学生回忆作品之中，通常也仅有寥寥数语，详细的生活细节更是不得而知。但这一时期是吴泽霖学术研究生涯的重要阶段，期间更是在服务抗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 二

吴泽霖在美留学期间除主修社会学外，还系统学习了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哲学、政治学等课程，这为他后来跨学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全面抗战爆



晚年的吴泽霖先生

发后，吴泽霖随校西迁贵阳，主持大夏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室，此间他充分利用贵州少数民族居多优势，授课之余亲率学生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先后编辑出版了《社会旬刊》《贵州苗夷研究丛刊》《大夏研究部乙种丛刊》《苗胞影荟》等大量调查研究成果。1941年初，因发妻陆德因女士过世，转而受聘西南联大社会学系，赴昆明任教。

社会学系在西南联大是个较小的系，时任系主任的陈达教授，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国情普查研究所设在呈贡文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多为联大社会学系师生，外加调查研究便利，此地俨然成了除西南联大之外，联大社会学系的又一重地。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在呈贡开展社会调查、人口普查、人事登记、农业普查等调查工作，吴泽霖一家所租住的墓庐虽离文庙极近，但他并未参与研究所的具体调查事宜。

1941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成立，12月20日在昆明上空首战告捷，被誉为“飞虎队”。为配合援华美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同年秋成立“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班址设在昆明西站原昆华农校内的美军第一招

## □ 联大春秋

待所内，又称“昆明训练班”。该班主任是励志社负责人黄仁霖，黄仁霖早年留学美国，与吴泽霖、潘光旦、闻一多便已相识。回国后，吴泽霖执教上海期间与黄往来频繁，二人关系十分密切。于是黄仁霖便向西南联大举荐潘光旦、闻一多、吴泽霖三人，因潘、闻二人在联大皆有行政职务，便由吴泽霖担任训练班专员，实际负责译员训练工作。西南联大同时指派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参与培训工作，一些教授也受邀出任训练班教员。此后，吴泽霖“联大有课，呈贡有家”，两地奔走，几乎已是生活常态。

1941年10月17日，战地服务团训练班第一期正式开班，全班35人。同年11月前后又招收第二期，两期共计征调内迁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70余人，其中半数为联大学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来华美军日益增多，训练班也相应扩大了招考人数，并连续办了七期，共培训译员429人。

1943年秋，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发生重大转折，为有效协同盟军对日军开展攻势，中国远征军再度入缅作战，随军翻译需求激增。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将征调西南联大等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为适应战时变化，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也改隶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由军委会外事局负责，原在昆明的干部训练班改称“军委会外事局昆明译训班”，简称“昆明译训班”。具体人事则变动不大，仍由吴泽霖任副主任，具体负责各项培训工作。西南联大再次给予译训班以大力支持，由樊际昌任教导主任，戴世光、鲍觉民主管训练业

务。马约翰、潘光旦、闻一多、温德、赵诏熊、赵访熊、高崇熙、黄子卿、吴达元、杨业治、汤佩松、黄钰生、陈友松、朱物华、徐毓楠、冯友兰、华罗庚、郑华炽、贺麟、蔡维藩等数十人都期复一期地在译训班担任教学工作，甚至有人说：“译员训练班工作的全班人马，都由联大包下来了。”

作为译训班的实际负责人，该项工作倾注了吴泽霖的很大心血。吴泽霖认为“艰苦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教授，既要拿笔杆子，也要用笔杆子帮助拿枪杆子来反攻日本”，因此，吴作为坚持抗战而又身体力行的联大教授，一直是站在第一线的。当时，不论是培训教学安排，还是译员结业去向，吴往往都会亲自过问，甚至当遇到联大教授因病、因事不能来班讲授英文课时，他就亲自代课。为动员各大学学生从军翻译，1944年初他还一度 and 西南联大梅贻琦常委等亲往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广西大学等校开展演讲，介绍译训班招考事宜。

昆明译训班自1943年11月开班至抗战结束，共计举办了11期，培训各类翻译人员达3000余人次。

吴泽霖教授在执教联大的同时，投身抗战服务，以自身学识参与抗战建国，为抗战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体现了一代学人的民族大义和社会担当，这正是西南联大知识群体抗战时期教育救国、学术报国的代表性实例。

### 三

来昆之初，吴泽霖在西南联大主要教授社会学和人类学课程，其研究方向依然放在少数民族方面，除在《社会研究》

《公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先前调查研究成果外，他还制定了《黔滇苗族调查计划》，鼓励指导学生去昆明附近的苗区开展社会调查，计划在少数民族研究方面继续深入。

但此后，随着抗战局势的不断恶化，加之译员培训等各类社会性工作繁重，吴泽霖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未能如愿展开。尽管如此，结合自身专业优长，本着服务社会的学术理念，他对抗战时期边疆的形势、民族地区的落后、民众的疾苦多有了解，认为有必要在云南省筹组一两个模型的、带有实验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为临近战区的边疆各族人民服务。1942年，新生活促进会扩大业务，计划在云南增设服务组，乘此机会，吴泽霖向负责人黄仁霖建议，把服务组业务扩大到少数民族地区，几经奔走，得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清华大学研究院和云南省卫生处等多方支持，同年5月、7月先后在墨江、丽江两地建立边胞服务站。边胞服务站为当地少数民族提供了一定的医疗和国民教育服务，并根据需要做一些抗战宣传活动。吴泽霖借此机会先后推荐数位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生参与服务站工作，指导学生注意收集民族文物和照片，为开展民族调查研究积累资料。

1943年夏，赴滇西考察期间，吴泽霖还亲自到丽江县了解边胞服务站工作，到纳西族地区开展社会调查。根据调查所得，撰写《么些人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么些人（纳西族）的家庭及家族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宗教信仰和征兆迷信，为民族调查研究进行了一次专业性的学术示范。除此之外，他还就调查发现撰写《从么些人的

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提出了实施边政建设、推进边民福利、发展边疆福利事业应遵循的原则等重要论断，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理论启迪和现实指导意义。

#### 四

吴泽霖教授自1941年2月来西南联大任教，至1946年4月提前离昆，前后旅居昆明长达五年之久，其家寄居在呈贡的时间约占了其中大半，而期间正是抗战最艰难、最困苦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吴泽霖忙于教学和译员培训工作，常年奔走于两地，与昆明的繁忙相比，呈贡的生活显得较为闲适。这里既不必为躲避日机轰炸而担忧，偶尔也可以享受来自家庭及周边朋友的浪漫。这其中在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所载的就有：1941年5月5日，吴参加国情普查研究所同仁举行的联谊会，游海晏；1941年12月24日，陈吴两家在呈贡吴寓所共度圣诞，气氛热烈。又有参与乡里婚丧嫁娶记载，想必作为社会学家在走进民众的同时，也可近距离观察呈贡民俗。

值得注意的是，此间岁月也是吴泽霖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除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之外，他对边疆、民族、人口等众多社会民族问题都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今天，学界对于吴泽霖这位在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博物馆学等众多学科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代大家的研究都比较深入，相关著述文章也极多。从中我们往往能够发现，吴泽霖所涉的多个研究方向，大多在抗战时期就能找到源头和路径。由此说来，这其中或许应该也有居住地呈贡“默庐”的功劳吧。